

土耳其伊斯兰极端组织概述

李艳枝*

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是伴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意识形态的分化而出现的,是极端伊斯兰势力对伊斯兰教的工具性解读和对伊斯兰教暴力方面的无限放大,对土耳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产生了较大影响。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互不统属,社会基础、斗争纲领复杂多样,而且许多组织犹如昙花一现。本文主要通过对土耳其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概述、对颇具代表性的土真主党与卡普兰社团的简介,来阐释土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基本特征。

一、土耳其伊斯兰极端组织概述

二战后,随着政府对伊斯兰教控制的放松和多党民主制的开启,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逐渐复苏,伊斯兰极端组织也破茧而出。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社会环境中,伊斯兰极端组织借助有利时机逐渐趋于活跃,曾经或仍然活跃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包括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土耳其真主党(Hizballah)、土耳其伊斯兰解放军(Turkish Islamic Liberation Army)、土耳其伊斯兰解放阵线(Turkish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伊斯兰革命军(Fighters of Islamic Revolution)、土耳其伊斯兰解放同盟(Turkish Islamic Liberation Union)、世界沙里亚解放军(World Sharia Liberation Army)、伊斯兰解放党阵线(Islamic Liberation Party Front)、土耳其全球伊斯兰解放军(Turkish Fighters of the Universal Islamic War of Liberation)、土耳其伊斯兰军(Turkish Islamic Fighters Army)、土耳其沙里亚复仇突击队(Turkish Sharia Revenge Commandos)^①、大东伊斯兰袭击者阵线、卡普兰社团(Kaplan Community,又名安那托利亚联合伊斯兰国家)^②以及伊斯兰解放党(The Islamic Liberation Party)^③的

土耳其分支等。有学者指出,土耳其约有300个伊斯兰极端组织,1980—1990年间,约有15000名极端组织成员在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和黎巴嫩接受培训,^④但并没有关于这些极端组织的确切记载资料。

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恐怖活动,但遭到国家的严厉镇压。早在1967年和1973年,伊斯兰解放党的土耳其支部领导人就因“试图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指控而被捕入狱。在1982年11月安卡拉的警察排查中,该组织土耳其支部的22名成员被抓,其中17名是约旦籍和巴勒斯坦籍学生,5名是土耳其人。^⑤经审问得知,该党有一本名为《基于古兰经和逊奈—伊斯兰宪法》的著作在土耳其印刷和传播,宣称所有伊斯兰国家应该统一在哈里发领导下成为单一国家,此后该组织在土耳其的活动趋于衰落。1980年政变后,尽管土耳其的极端势力受到一定打击,但由于军方政府及祖国党政府对伊斯兰教的利用更加明显,伊斯兰极端组织仍有一定的活动空间。1981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土耳其遭受暴力袭击,调查结果表明枪击者麦赫迈特·阿里·阿格卡(Mehmet Ali Agca)是一名伊斯兰极端主义者。1984年出现的“真主党穆斯林”宣称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声称

*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

① Ely Karmon, "Radical Islamic Political Groups in Turkey",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 No. 4 (1997), pp. 2—3.

② Marvin Howe, *Turkey Today: a Nation Divided over Islam's Revival*, US: West View Press, 2000, p. 50.

③ 伊斯兰解放党是由纳卜哈尼于1953年创立于约旦的旨在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组织,由于其到处煽动伊斯兰革命遭到许多国家的禁止。该组织于1962年开始在土耳其活动,20世纪80年代则逐渐趋于衰落。

④ 同注②,第52页。

⑤ Mehmet Yasar Geyikdagi,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The Role of Isla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p. 151.

他们保护的不仅是国家和宗教,而且是“安拉之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多次发动了针对世俗知识分子的暴力行动:土耳其法学会会长姆马尔·阿克叟伊(Muammer Aksoy)和温和的伊斯兰学者巴波瑞耶·乌柯克(Babriye Ucek)先后被伊斯兰极端分子暗杀;1991年10月,伊斯兰圣战组织因反对召开马德里和会刺杀了一名美军士兵,重伤埃及外交官,并策划了针对约旦、沙特和伊拉克外交官的暗杀事件;1993年,伊斯坦布尔发生汽车爆炸暗杀事件,负责调查土耳其人权事件的乌戈尔·穆姆库(Ugur Mumcu)死于非命。成立于1985年的大东伊斯兰袭击者阵线发动了一系列针对酒吧、舞厅和基督教堂的恐怖袭击,还宣称对圣索菲亚、部分银行和犹太教团领导人的暴力袭击事件负责,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1992年和1993年,该组织先后制造了两起汽车炸弹事件,将曾报道土耳其恐怖组织的两名记者炸死。该组织领导人萨里·米亚比扎卢先后撰写了40多本宣扬激进思想的书,土耳其政府于1998年以企图利用暴力颠覆国家秩序罪将其逮捕。

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不久的2003年4月3日凌晨,英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前发生爆炸;同日上午,美国联合包裹运输公司伊斯坦布尔分公司大楼遭炸弹袭击;8月10日,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连串炸弹袭击事件,同时政府部门、西方国家驻土耳其机构、大学和大型商场不断接到威胁电话或电子邮件;11月15日,伊斯坦布尔的两座犹太教堂——内夫·沙洛姆犹太教堂和贝斯·以色列犹太教堂几乎同时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25人死亡、303人受伤。埃尔多安总理对这起以伊斯兰名义制造的流血事件深表震惊:“我诅咒他们,这种袭击是非人道的行为。”^①20日,位于伊斯坦布尔中心商业区的英国汇丰银行土耳其总部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30余人死亡、461人受伤。26日,英国外交部发出旅游警告:“我们所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可能再次发生攻击事件。我们促请大家保持警觉……”。“基地”组织宣称这些恐怖事件是他们所为,而大东伊斯兰袭击者阵线也声称对袭击

事件负责,警方发现土耳其真主党也与该事件有直接联系。11月,土耳其在恐怖袭击中死亡的人数达到91人,因为自杀式袭击发生在莱麦丹月,埃尔多安声称:“那些血染圣日和屠杀无辜民众的人将要为其两世的罪责负责,他们将永生堕入火狱。”^②由于这些恐怖事件破坏性极大,而且需要大量的现金支持和技术保障,所以可能是多个伊斯兰极端组织联合所为,最终土耳其警方逮捕了多名嫌疑分子。此后零星的恐怖活动时断时续,2006年4月12日,一位天主教徒在特拉布宗被枪杀;2007年1月19日,一位17岁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伊斯坦布尔街头暗杀赫冉特·坠克(Hrant Drink),并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发出威胁,迫使其流亡美国。^③埃尔多安政府严厉谴责此类暗杀事件,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恐怖事件的发生,随后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活动相对平息。

二、土耳其真主党的兴衰

真主党是阿拉伯语“Hizballah”的意译,许多人将土耳其真主党与黎巴嫩真主党混为一谈,认为前者是后者在土耳其的延伸,其实土耳其真主党与黎巴嫩的真主党及其在中东诸国的分支并没有组织和思想联系。^④还有一些人则将其归于伊朗的极端组织,因为伊朗曾经给予土耳其境内的极端组织一定的支持和资助。土耳其真主党尽管深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却是土耳其本土土长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其产生、发展、衰落与库尔德问题密切相关,胡赛因·韦利奥卢(Huseyin Velioglu)是其主要领导人。

土耳其真主党是致力于恐怖主义行动的极端组织,最初主要在土耳其东部、东南部库尔德地区活动,成员多为库尔德人,后来逐渐将触角伸向全国。其成员最初在库尔德工人党的训练营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但这两个极端组织之间的协作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不久真主党指控库尔德工人党是穆斯林

^① Muammer Kaylan, *The Kemalist: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Fate of Secular Turkey*,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5, p. 436.

^② 同上。

^③ David Shankland, “Islam and Politics in Turkey: The 2007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1, 2007, p. 367.

^④ Augustus Richard Norton, “Hizballah: From Radicalism to Pragmatism?” *Middle East Policy*, Vol. 5, No. 4, January 1998.

的谋杀者、亚美尼亚人的合作者、为共产主义服务者和穆斯林社团统一的分裂者,因而被土耳其当局吸纳为反库尔德工人党的组织。真主党成员利用清真寺来传播思想、发展成员和扩充军事设备,还在市中心设立书店,发售宗教书籍和相关出版物。敲诈勒索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但他们一再声称得到大批商人的金钱和物质资助以掩人耳目。随着实力的增强,土耳其真主党逐渐向大学生、教师、教职人员和公务员等中上社会阶层扩充势力和影响。土耳其军方曾表示,真主党分子不但遍及社会各阶层,甚至还渗透到政府各部门。1999年,土耳其警方在迪亚巴克尔、马丁、巴特迈等省缴获了大约两万页真主党的秘密文件资料,这些文件揭示了该组织严密的内部组织机构,其最高委员会甚至包括了土耳其的高级军官和政客等。^①

土耳其真主党计划严密、分工明确。他们认为刑讯和杀戮是宗教虔诚的表现,试图通过摧毁其他组织来证明其正义性,那些被他们视为非正义组织的不仅包括异教徒组织,还包括那些他们认为与其信仰不同的在错误道路上前进的穆斯林团体。土耳其真主党主要采取恐怖主义行动来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目的,并采取绑架、暗杀等手段来扩大社会影响。2000年,土耳其警方对真主党聚居地的围攻中发现几十具受害者的尸体,他们多是在被绑架并遭到令人发指的折磨后被活埋,真主党犯罪分子甚至还将凌辱过程用小型摄像机拍录下来,向幕后主使者邀功请赏。根据这些录像、现场证据以及犯罪分子的供词,警方查明真主党实施恐怖行为的具体过程:受害者被劫持后,通常会被关在狭小的地洞里数月之久,此间暴徒经常会通过心脏起搏器电击、铁链抽打、火钳炙烤、强注毒品或全身捆绑后关进电冰箱等方式对被绑架者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以迫使其改变世俗立场,或向真主党交出个人财产。警方最终在全国20多个省份逮捕了700多名真主党成员及1000多名同情分子,还破获多处真主党的弹药库,起出诸如迫击炮、火箭筒、手榴弹、自动步枪等大批枪支弹药。民众第一次领略了该组织手段之毒辣、行为之令人发指,于是其成为众矢之的,土政府发动了旷日持久的打击真主党的行动。

土耳其许多分析家认为真主党被当局用作反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工具。记者乌马尔·塔鲁(Umur Talu)甚至称土耳其真主党为“爪牙组织”。^②埃因·玛库颇严(Eyen Mahcupyan)公开宣称:“我们都知道,这个组织(土耳其真主党)是被国家利用,实现特殊目的的工具。”^③实际上也确实如此。鉴于库尔德工人党在库尔德人中间的强大号召力和影响力,土耳其当局需要一个同样具有强大号召力的伊斯兰组织与之抗衡,因而土耳其真主党成为首选对象。1990—1995年间,库尔德工人党控制了土耳其东南部大部分地区,于是政府借助土耳其真主党先后杀害了500余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和其他库尔德组织成员,包括库尔德记者、知识分子和政客等。许多人认为真主党是国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样一个活动频繁的伊斯兰极端组织能够存在,与政府的包庇和容忍不无关系。前总理埃杰维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承认曾向真主党提供武器,总统德米雷尔则说这批武器最初在军方的控制之下,指责国家对这次犯罪行为负责是没有用的;后来他承认国家有时背离了其基本原则。^④不过,随着库尔德工人党对国家威胁的解除,真主党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利用关系宣告解体。《民族日报》的记者沙扎克指出,真主党实际上受一个“幕后政府”的保护,这是过去十年来发生的数十起神秘政治谋杀案至今未获侦破的原因。只不过现在库尔德工人党大势已去,才有今日对真主党的大搜捕。著名的伊斯兰知识分子阿里·布拉克曾说,“国家是熟知真主党的,并极力为其掩饰,随着库尔德工人党的失败,国家必然将矛头指向真主党。”^⑤

土耳其真主党内幕的公开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世俗主义者将其视为伊斯兰主义威胁国家政权的主要证据,土耳其军方宣称正是由于政治伊斯兰的发

① Bulent Aras and Gokhan Bacik, "The Mystery of Turkish Hizballah", *Middle East Policy*, Vol. IX, No. 2, June 2002, p. 153.

② Bulent Aras and Gokhan Bacik, "The Mystery of Turkish Hizballah", p. 149. 转引自 *Milliyet*, January 19, 2000.

③ Bulent Aras and Gokhan Bacik, "The Mystery of Turkish Hizballah", p. 149. 转引自 *Radikal*, January 30, 2000.

④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5, 2000.

⑤ Bulent Aras and Gokhan Bacik, "The Mystery of Turkish Hizballah", p. 149. 转引自 *Zaman*, January 27, 2000.

展导致这种非法组织的产生。^① 1997年,土耳其军方主导的迫使伊斯兰政党下台的软政变旨在抵制伊斯兰主义的威胁,因为在军方看来伊斯兰主义者是比库尔德工人党更为严重的威胁,于是对真主党展开调查和镇压。1998年春,当军方取缔繁荣党时,警察力量也在土耳其东南部的迪亚巴克尔和巴特迈等省发动了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在安卡拉大学纪念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研讨会上,军方领导人指出土耳其真主党卷入400余起暗杀事件,已有300名真主党好战分子被逮捕。^② 不过伊斯兰政党极力否认与土耳其真主党有染,埃尔巴坎曾向宪法法院辩护说:对我们而言,不可能注意到400万党员的个人动向。^③ 尽管许多报纸和电视报道宣称美德党成员与真主党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美德党领导人库坦却声明这是政府的一种措辞,是为了压制美德党的发展。^④ 所以当真主党的恐怖行动大白于天下时,许多伊斯兰主义者也极力谴责其恐怖行为。

2000年5月30日,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塞泽尔总统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打击宗教极端势力问题,会议决定对土耳其现有的20多个宗教团体和协会拥有的各种组织机构进行调查,并在4个月内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详细报告。埃杰维特总理曾表示:“尽管存在各种困难,但政府决心在短期内扫除恐怖主义威胁,除掉真主党。”^⑤ 2000年7月底,土政府又颁布命令解雇政府机构中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联系的雇员。与此同时,土耳其警方在全国进行拉网式搜捕,国家安全部队首先对伊斯坦布尔的一座疑为“真主党”巢穴的别墅发动闪电袭击,在激战中击毙了土耳其真主党首领韦利奥卢,生擒两名骨干成员。紧接着安全部队又对安卡拉和东南部地区进行突然袭击,一举逮捕了数十名真主党嫌疑犯。虽然政府打击力度和决心很大,但在短期内彻底铲除该组织十分困难。由于该组织植根于土耳其的严重社会问题:城市化运动造成的部分民众日趋边缘化和极端化处境,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以及腐败危机造成的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所以尽管真主党遭受重创,但仍然涉嫌参与2003年伊斯坦布尔的连环爆炸案。不过,作为土耳其的非主流伊斯兰组织,真主党仅仅是作为以暴制暴的工具而存在。随着正义

与发展党政府贯彻多元主义和务实开放的治国方针,民众对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支持将会进一步削弱,其生存的理由也将逐步消失。

三、卡普兰社团的兴替

卡普兰社团即为安那托利亚联合伊斯兰国家,在土耳其又以Kara Ses著称,是一个总部设在德国的极端伊斯兰组织,其兴替演变与其创立者卡普兰(Cemalettin Kaplan, 1926—1995)关系密切。卡普兰出生于埃尔祖鲁姆省的一个伊斯兰学者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安卡拉大学神学院,1966年获伊斯兰神学学士学位,此后被任命为宗教事务局的宗教监督员,后来又在阿达纳市担任穆夫提。1980年军事政变后,卡普兰因参与反政府活动而引起当局的注意,被迫于1981年提前退休,不久逃离监视飞往德国,宣传“用基于伊斯兰法的国家取代土耳其世俗民主国家”。卡普兰深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坚信伊斯兰教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理论依据,并在现实社会中得以实现。而且霍梅尼以法国为根据地领导伊斯兰运动从而在伊朗创建伊斯兰共和国的先例也深深激发了他,所以他计划以德国为据点在土耳其创建伊斯兰国家,并将其宣传录像带走私到土耳其以动员民众参与伊斯兰革命。他曾经出版了一本几乎是伊朗宪法翻版的伊斯兰国家宪法,并在演讲中强调伊朗革命是一场伊斯兰革命而非教派革命,这就淡化了伊斯兰革命的教派色彩,从而消解了逊尼派对其的质疑和反对。

卡普兰于1985年创建伊斯兰协会和组织联盟(ICCB),呼吁所有穆斯林加入该组织,提出“古兰经是来源、先知是典范和领导人”的口号;宣称“使古兰经成为宪法,沙里亚法成为法律,土耳其国家成为伊斯兰国家”。卡普兰的话语旨在动员追随者实现伊斯兰革命,反复强调一个人或者支持或者反对土耳其国家:“你或者与真主站在一起,或者与偶像崇

^① Bulent Aras and Gokhan Bacik, *The Mystery of Turkish Hizballah*, p. 155.

^② “Seminar Hears of Fight Against Terror”, *Turkish Daily News*, July 1, 1998.

^③ Marvine Howe, *Turkey Today: a Nation Divided over Islam's Revival*, US: West View Press, 2000, p. 54.

^④ 同注①,第156页。

^⑤ *Turkish Daily News*, January 20, 2000.

拜者站在一起;你或者是支持该政权或者是反对该政权;你或者是坚定的凯末尔主义者,或者是支持沙里亚法;你或者是与国家站在一起,或者是反对该国家。”^①他的思想充满着这种二元对立的趋向,缺乏中庸与调和意识。卡普兰宣称宗教与国家的分离将会导致国家在制定法律时丝毫不考虑真主的法律,给予国家或个人制定法律的权力将使他们的政权成为偶像崇拜的对象。也就是说政教被分离,俗世和国的事务赋予偶像崇拜者,其他的则给予真主,这是对真主独一信仰的破坏,这显然是赛义德·库特布思想的翻版。卡普兰经常称土耳其共和国是第一个贾希利叶时代。^②既然伊斯兰教已经被世俗政权所腐蚀,那么通过法律的伊斯兰化来重建真主独一则是穆斯林的神圣职责。他试图将其他伊斯兰社团汇集在其领导下,然而并没有别的伊斯兰组织愿意听从他的调遣,于是其组织逐渐趋于封闭和保守。1992年,卡普兰宣称建立安那托利亚联合伊斯兰国家来取代土耳其世俗政权,宣称他就是哈里发,但该举动使部分追随者离他而去。

1995年卡普兰去世,爆发了继承人之间的冲突。有流言声称卡普兰最先任命物理学家伊伯拉罕·叟夫(Ibrahim Sofu)担任继承人,后来改变任命而让其儿子麦廷·卡普兰(Metin Kaplan)继任哈里发。1996年,叟夫宣称其是合法的哈里发,与麦廷·卡普兰之间的矛盾公开化。1997年5月9日夜,三名杀手将熟睡中的叟夫杀害,麦廷·卡普兰本人在1999年3月因为煽动该次谋杀而被捕,并于2000年11月被判处4年监禁。根据其供词,他所领导的卡普兰社团拥有1500名成员,遵循沙里亚法,并资助穆斯林在阿富汗、波斯尼亚和车臣的斗争与军事行动。2001年11月,德国议会通过反恐法,清除宪法对破坏性言论和基于信仰的组织性犯罪的保护,12月,卡普兰社团和19个附属机构被取缔,当局还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2004年10月12日,麦廷·卡普兰被引渡回土耳其,土耳其以阴谋反对国家和试图用伊斯兰法取代土耳其共和国法律的指控而将其判处终身监禁。

卡普兰社团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83年社团产生到1992年在科隆建立安那

托利亚联合伊斯兰国家。此时该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机构邀请每个穆斯林加入其阵营,所以处于较具活力的发展阶段。第二阶段则是从卡普兰宣布自己为哈里发到其1995年去世。1992年,卡普兰在科隆宣布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并声称自己就是哈里发,此时该组织与其他伊斯兰组织逐渐疏远而趋于封闭。卡普兰宣称自己是哈里发就排斥了其他伊斯兰领导人的合法地位,当然不能获得广泛认可和支持。他还要求追随者不能和那些不忠诚于哈里发国家的人结婚,割断追随者与其他伊斯兰出版机构的联系,这种封闭有效地阻止了追随者利用其他渠道的宗教知识来挑战卡普兰对宗教权威的垄断,但也使得该组织因固步自封而缺乏生机。第三阶段是从1995年到2001年12月。卡普兰去世后,由于要应对来自叟夫的挑战,麦廷·卡普兰增强对追随者的控制,造成卡普兰社团进一步分化。1997年1月,一伙卡普兰社团的领导人来到阿富汗,带来麦廷·卡普兰的书籍和口信,并在一个“基地”组织训练营见到本·拉登。这是该组织与“基地”组织的首次直接接触。此后不久,卡普兰社团密谋在安卡拉的阿塔图尔克陵墓策划一场自杀性炸弹袭击,该计划包括在纪念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用一架装满炸药的飞机撞向陵园的高地,借此炸死几百名参加庆祝大会的国家政要和军方代表。该计划因土耳其当局及时逮捕了卡普兰社团的18名核心人物而流产。这种极端的恐怖主义行为使部分仅仅出于宗教虔诚而追随麦廷·卡普兰的人感到恐惧,离开该组织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卡普兰通过发布法特瓦赋予其宗教知识的合法性地位,当他宣称自己就是哈里发时,其所发布的法特瓦就具有了特殊的力量。他通过发布法特瓦将其追随者与其他伊斯兰组织区别开来,一些法特瓦赋予成员蓄胡须、戴头巾、斗篷等行为的合法性。他认为谢赫赛义德、赛义德·努尔西、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布等都是坚持圣战的烈士,宣称穆斯塔

^① Ahmet Yükleven, *The European Market for Islam: Turkish Islamic Communit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Dissertation of Boston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 2007, p. 321.

^② 同上,第323页。

法·凯末尔及其追随者是异教徒,指出其宗教职责在于破坏由凯末尔及其追随者建立的非法统治,以将国家转给真正的所有者。“我们决定复兴这个历史的、重要的、神圣的沙里亚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在真主的帮助下使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向安那托利亚、伊斯兰世界和全世界的民众宣传这个真理。”^①指出那些宣称忠诚于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是卡普兰社团成员,而那些不忠诚者则是旁观者。卡普兰在1993年5月14日发布的法特瓦称三类人为多神论者:第一类为土耳其议会成员,他们参与了偶像崇拜,因而是叛教者;第二类是投票支持和经济支持土耳其现行制度的人;第三类是那些并不接受该法特瓦的人。由此可见卡普兰与一般伊斯兰学者的区别。

随着卡普兰对宗教解释的垄断,其对追随者的控制愈益严格。卡普兰的追随者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最早移民德国的劳工,他们相信掌握伊斯兰来源的卡普兰不会在遵循伊斯兰教方面犯错。第二部分则是年轻移民,他们相信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带来一个完全的伊斯兰制度,一些年轻的追随者加入卡普兰社团是对他们的父辈权威反抗的结果。最初卡普兰提醒追随者其处于宣教而非武力反抗的阶段,所以并不倡导激烈的暴力行动,但麦廷·卡普兰认为已经进入革命阶段,到了使用暴力的时候了,主张通过吉哈德的动员来惩罚叛教的土耳其统治者。卡普兰社团在1998年5月3日集会,庆祝徙志第1419周年和即将到来的伊斯兰历新年。当麦廷·卡普兰作为最后的发言者进入大厅时,与会者全体起立高呼“安拉至大”。麦廷·卡普兰在其演讲中再次重申了发动伊斯兰革命的三个场所:伊斯兰神学院、苏非道堂和兵营,宣称所有的宗教科学必须在伊斯兰神学院中得以研究,追随者将通过苏非道堂的齐克尔得以精神提升,将在兵营中学会如何斗争,“感谢真主,我们已经到了兵营的阶段”。^②哈里发国家和其他世俗国家一样也有士兵和武器。他宣称这是在这里的最后一次会议,下一次会议将会在伊斯坦布尔的阿亚索菲亚清真寺举行。最后他号召所有人参与“普遍的吉哈德动员”,并要求每个人起立以示对即将发布的法特瓦的尊敬。他先后用阿拉

伯语和土耳其语宣布了法特瓦,宣称在哈里发麦廷·卡普兰领导下发动的指向土耳其政权的斗争是得到真主允准的职责,将会夺回这些土地,并惩罚那些背离信仰的凯末尔主义者。宣称在此次斗争中死亡的穆斯林将成为烈士,将以“加齐”的身份获得永生。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极端色彩的伊斯兰组织,卡普兰社团也存在着失败的因素:一是卡普兰社团在人力和经济来源方面存在不足。尽管卡普兰试图成为霍梅尼的翻版,但并不具备霍梅尼的奇里斯玛式权威。霍梅尼接受来自世界各地无数新闻记者的采访,而卡普兰仅仅得到一部分记者且主要是来自土耳其记者的采访。他先后给土耳其的政治和宗教领导人写信来动员他们支持伊斯兰革命,但并没有争取到更多追随者,其社会基础反而逐渐萎缩,所以在社团组织发展方面缺乏必要的人员和资金。二是卡普兰社团在提供活动和服务方面并没有任何比较优势,而且其极端的话语并不容易获得更多穆斯林的支持。德国的土耳其移民遭遇不同的伊斯兰组织的争取,而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卡普兰社团并没有提出更具吸引力的服务和政策,反而越来越失去其支持者。而且卡普兰对宗教权威的垄断也使其陷入孤立,随着他们在土耳其革命的目标和动力的消失,其极端性的话语则使自己离普通穆斯林越来越远。三是卡普兰社团旨在动员其追随者改变土耳其的民主政权而建立以沙里亚法为基础的神权国家,这对于向来并不热衷暴力行动的土耳其民众而言并不具有吸引力,况且土耳其民主政治的相对成熟也使得伊斯兰极端思想在国内没有多大市场,接受凯末尔主义洗礼的新生代穆斯林尽管对世俗主义颇有微词,但是倡导多元和务实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则迎合了他们的情感和宗教需求,所以卡普兰社团的相对沉寂就是一种历史必然。

四、土耳其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衰落

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是在其现代化进程

^① Ahmet Yükleven, *The European Market for Islam: Turkish Islamic Communit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Dissertation of Boston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 2007, p. 328.

^② 同上,第334页。

中,部分伊斯兰势力通过对教义的极端化利用而形成的少数派力量,是伊斯兰政治化的产物。

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没能成功整合诸多社会因素是这种极端组织存在的根本原因。虽然现代化纲领试图将不同宗教和种族群体整合进现代文明,但并没有提供整合的方法和途径,在摸索中前进必然要威胁一部分人的利益,从而使得现代化进程遭遇暂时的波折。另外国家对安全的过度关注也使其较少考虑社会和经济问题,而经济落后则是导致社会动乱的元凶,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孕育的土壤。而且,土耳其的宗教、民族政策也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世俗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阿拉维派—逊尼派之间的冲突提供了理由,土耳其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解,所以只要诱发冲突的因素没有消失,伊斯兰极端组织就仍有生存的空间。

由于大多数伊斯兰极端组织主张采取暴力和恐怖的手段实现其目标,为土耳其当局所不容,因而难以获得合法身份。玛尔维尼·浩维称土耳其的极端组织为土耳其政治社会中的阴暗面,^①这反映了民众对这些极端组织的态度和立场。尽管一些不可预

料的行动和言论能够激发宗教暴力行为,但土耳其的宗教暴力并不能与阿尔及利亚臭名昭著的屠杀、埃及致命的大规模袭击或黎巴嫩的教派冲突相提并论。麦廷·黑珀指出,到目前为止,这些团体的影响仅仅是边缘性的,因为他们是如此分散,并没有确立彼此之间的联系且缺乏真正的领导人。^②因此,尽管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但相对于中东国家的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而言,影响力还很有限。有关专家认为,土耳其境内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警方反复扫荡后消失了,他们的领导人或死或被关进监狱,失去了资金来源和人力补给,所以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尽管这有些武断,因为许多极端伊斯兰组织似乎进行了重组,并与国际恐怖组织联系起来,而且那些在境外活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可能重返土耳其参与恐怖爆炸案,但这充分说明土耳其政府战胜极端伊斯兰组织的乐观态度,也证明了土耳其伊斯兰极端组织在民主政治框架内逐渐衰落的发展趋势。◎

^① Marvine Howe, *Turkey Today: a Nation Divided over Islam's Revival*, p. 48.

^② 同上,第50页。

(上接第12页)向罗兴亚族的渗透。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罗兴亚穆斯林反政府武装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有着较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一是财政资助。公开材料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团结组织开始接受孟加拉伊斯兰组织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及其激进学生派别伊斯兰学生营(Islami Chhatra Shibir)的资助。二是援助、联络、招募与受训。根据《简氏全球暴乱与恐怖主义》(Jane's World Insurgency and Terrorism)的报告,自罗兴亚穆斯林团结组织在孟加拉国建立基地以来,该组织内至少有一个派别与孟加拉国境内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运动(Harakat-ul-Jihad-ul-Islami, HuJI)有联系。该组织所持教义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一致,并与它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该组织从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中招募成员,甚至还接管了罗兴亚穆斯林团结组织在孟国内的营地和一些训练设施。另据报道,罗兴亚穆斯

林团结组织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得到了巴基斯坦“圣战者运动”(Harkat-ul-Mujahideen, HuM)的援助,而后者在1997年、2001年和2002年先后被美国、英国和印度列入恐怖组织的名单。阿富汗“伊斯兰党”(Hizb-e-Islami)则是罗兴亚穆斯林团结组织的另一个早期支持者。通过这些组织网络,罗兴亚穆斯林团结组织得以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其他伊斯兰激进组织建立起联系。许多罗兴亚人直接从孟加拉国被征募,并在转交塔利班前于巴基斯坦受训,甚至有超过100名罗兴亚穆斯林团结组织的成员曾直接在阿富汗接受“伊斯兰党”的训练。“圣战者党”(Hizb-ul-Mujahideen),更是在罗兴亚穆斯林被驱逐出缅甸之前就已派遣顾问到若开山脉中训练穆斯林游击队员,该组织于2002年被印度定位恐怖组织,2003年被巴基斯坦定位极端组织。◎

^① Andrew Selth, "Burma's Muslims and the War on Terror",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7 (2004).